

#### 四、结论

我对于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代表者，是知道的最清楚和具体的。他的一举一动，无一不是本着日寇的大陆政策，由松到紧，由一部扩充到全般地一步一步来进行着的。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不知道曾经残害了多少中国人民的性命，往小里说，也害了我，差一点把我也同时扯到无底的黑暗继续的真泥沼里去。所谓的微笑和小恩小惠，我现在算是知道了，那不过是笑里的尖刀及包着毒药的馒头罢了，只要一上了他们的圈套，不是死就是虽然活着也没有脸去见人的被注定的结果在等候着，这就是我对于此事的一个结论。

#### 伪满协和会前两任中央事务局次长

常 德

伪满协和会于1932年7月25日在伪都新京（长春）成立。首任中央事务局次长是中野琥逸，二任次长是山口重次，两人分别为大雄峰会和满洲青年联盟的骨干。大雄峰会与满洲青年联盟都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几年，以满铁社员为核心，由在中国东北的日侨组成的反动团体。这两个团体的成员都因积极鼓吹日本侵占“满蒙”，建立“满蒙独立国”而受到日本统治当局的重视，被视为日本“在满”殖民者的“先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野和山口都与大雄峰会和满洲青年联盟的其他一些人一起，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旨意，积极筹划与建立伪自治指导部，为日本侵略者控制与夺取县级

政权献策出力。其中，中野琥逸尤为突出，他充当了伪自治指导部的顾问，提出了《关于地方自治指导秘案》，作为关东军研究地方自治指导制度的基础，并担任伪自治指导部内所设的自治指导训练所所长及教员，讲授所谓“自治指导精神”和“政治哲学”。所培训的“自治指导员”派往辽、吉两省40余县计100余人，分别担任各县的“自治指导委员会”委员长或委员。他们以指导“自治运动”为名，具体控制各县的政权，进而为建立全东北的伪政权作准备。此时中野琥逸还充任伪奉天市政府的最高顾问，和其他日本人顾问一起，积极为筹建伪辽宁省政府而效力。山口重次则充任关东军统治部交通课长，协助关东军组成了沈海铁路保安维持会，恢复了沈海铁路的运输。

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后，伪自治指导部撤消，中野与山口又投身于创立伪协和会的活动之中，并先后充当了协和会的头目，掌管协和会的实权。其中，山口重次在伪满政权建立后，未能参政，依然处于在野地位，但他不甘心寂寞，仍在下面纠集同伙，积极筹建法西斯组织，以期辅佐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实行法西斯统治，初拟名为“满洲协和党”。山口重次等人的活动，得到了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支持和关东军司令官奉天策的首肯。遂于1932年4月1日，在沈阳的日本人忠灵塔前举行了结党宣誓。该党本部设在沈阳，内分总务、组织、宣传、监察等四部，各部部长分别由汉奸于静远、阮振铎（担任组织、宣传两部部长）和日本人和田劲充任，由山口重次及小泽开作掌握实权。协和党成立后，便在东北各地建立支部、发展党员，并随同关东军在东北各地进行镇压抗日武装和开展“宣抚”工作。当年4—5月，由山口重次主持，协和党派出数十人组成12个宣抚班，配合关东军在中东铁路沿线和三江地区进行欺骗宣传，搜集情报，残害抗日军民等勾当。同时，山口重次还在东边道地

区成立了以他为总指挥的东边道特别工作机构，拼凑各种反动力量，刺探抗日武装情报，征集物资，欺压民众，充当关东军讨伐队的爪牙。此外，山口重次还利用协和党编辑了许多鼓吹“民族协和”和反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材料，在中国东北和日本各地进行广泛传播。当国联调查团来东北时，又指派汉奸于静远、阮振铎等出面，充当伪国民代表，同国联调查团人员座谈，叫嚣东北应与中国脱离。

满洲协和党成立后的反动活动，得到了关东军首脑的青睐，决定将其建成伪满国内唯一的官办的政治团体。但因标榜“无党政治”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不同意用党的名称，遂将协和党改成协和会。于是经过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花谷正、片仓衷等人和原协和党要员们的积极筹备，于当年7月25日在伪都新京正式召开了有关东军司令官、伪满执政及满族、关东厅头目参加的协和会成立大会。会上听取了执政溥仪的训词，通过了协和会的创立宣言、纲领和章程，确立了协和会机构和头目，即包括名誉总裁（溥仪）、名誉顾问（本庄繁）、会长（郑孝胥）、理事长（张燕卿）、名誉理事（桥本虎之助、驹井德三、板垣征四郎）和理事43人。并在沈阳设立中央事务局，中央事务局委员共10人，中日各半，蒋介石为中央事务局长，中野琥逸为次长，山口重次为委员。中央事务局内设总务、组织、宣传、审查四处。下设京师、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奉天等五个地方事务局。

中野琥逸充当第一任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之后，主要是继续扩大与加强了协和党时期的随军“宣抚”工作。除保留原在北满、东边道等地的宣抚班外，又新增设了宣抚机构。其中，在1932年10月，为配合朝鲜军对鸭绿江沿岸各县的讨伐，协和会组织了18人参加的5个宣抚班，随军到鸭绿江沿岸各县进行

宣抚工作达两个月之久。随后则在当地设置了协和会的县办事处。1933年3月，为配合关东军侵占热河，协和会又组成以中野琥逸为总指挥，以热河省事务局和兴隆、朝阳、隆化、围场四县办事处人员15人参加的5个宣抚班，随同关东军第九师团赴热河各地进行长达半年的“宣抚”工作。

中野琥逸任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后不久，随着关东军首脑人员的变动，使协和会的发展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1932年8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片仓衷等相继调离，接任的关东军司令官为武藤信义，参谋长为小矶国昭。小矶国昭对协和会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协和会是政党组织，主张解散。旋因在幕僚会议上主张解散的占少数，所以仍予保留。此后，小矶国昭把协和会委托给伪政府处理，他对伪总务厅代理长官阪谷希一发出被称为“小矶通牒”的三条指令，即：（1）协和会不能成为政党；（2）不能把协和会作为政府的前身；（3）协和会是否以教化团体继续存在任凭阪谷决定。同时，他还积极活动，准备把日本国内的法西斯组织“正义团”引至中国东北，用它来取代协和会。为此，经过他的斡旋，于1932年9月在沈阳举行了“大满洲正义团”结团仪式，并决定将协和会的一小部分预算分给“大满洲正义团”。小矶国昭的不支持，使协和会的活动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协和会中央事务局于1933年3月15日由沈阳迁到长春，设在满铁附属地中央通21号。3月18日，中央事务局次长中野琥逸辞职，由山口重次接任。中野辞职后改任民政部总务司长、吉林省总务厅长等职，1936年7月至1937年4月间，又在伪协和会担任过指导部长职务。

在中野琥逸任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期间，山口重次以审查委员的身份，曾积极为协和会的发展壮大而四处活动。他接

任中央事务局次长之后，为了改变协和会的困难处境，其活动更为积极、卖力，以图扩大协和会的组织与影响。其活动内容除继续派人配合关东军对东北各地抗日武装与民众进行讨伐、扫荡，以取得关东军的信任和支持外，还为强化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与活动：

（一）进行“日满亲善”活动。如设立日满亲善团体，组织东北实业者访日，开办日语学院，举行“日满”青年及儿童联欢等，以扩大协和会在东北及日本各地的影响。其中突出的有，1932年8月，在伪满首都召开所谓“日满青年大会”，举行联欢活动，参加人员有日本一些大学的师生1200人和中国东北青年600人，会议还决议组成大亚细亚青年联盟。

（二）举办协和会讲习会。于1933年9月在沈阳南关原东北大学校址开始讲课，共吸收各类学生50人，由山口重次兼任讲习所所长，邀请日军及伪政府官吏作教员，为协和会培训骨干。学员除学习“理论”外，还需直接参加随军讨伐抗日武装的“实践”。学员1934年3月毕业，分配到协和会中央与地方事务局及各办事处工作。

（三）掀起实行帝制的“拥戴皇帝运动”。于1934年1月始，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等省及所属一些市县，纷纷召开由协和会主办的帝制请愿市民大会，选出请愿代表计99人，并让这些代表参加当年2月28日在伪满首都召开的第一次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

经过山口重次主持与组织的上述各项活动，使协和会壮大了组织，增加了人员，也扩大了影响。到1934年春时，协和会已有中央事务局1个，地方事务局7个，办事处37个，分会900个，会员达30万人。同时，在1934年2月下旬，由于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离任，西尾寿造接任，使协和会也开始脱离了因

境。但由于协和会吸收了一些地方实力派，使之与伪满地方政权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与对立，加之协和会中央会计科又发生违纪事件，使在关东军和伪满政权的部分官吏中撤销协和会的议论又有抬头。于是便于1934年9月对协和会进行了第一次改组，企图使协和会与伪满政权机构“一体化”。改组的结果，对山口重次不利。虽然中央事务局委员人数由10人增至15人，但在野的山口重次次长等5人却被赶出了协和会，换上了伪满政府机关的官吏。其中，协和会的中央事务局次长，由伪总务厅代理长官阪谷希一兼任，伪国都建设局总务处长结城清太郎任协和会中央事务局的专任委员，部分地实现了伪满官吏与协和会头目的“一体化”。到1935年9月，又由满铁地方课长、满洲青年联盟干事平岛敏夫接替兼职的阪谷希一，专任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

山口重次离任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后，又于当年改任伪奉天市政府参事官，1936年转任其总务处长。1937年7月任伪国务院总务厅参事官，同年12月转任伪牡丹江省次长兼该省协和会本部次长，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法西斯殖民统治效力。

### 关东州厅警察部长潮海辰亥的罪行<sup>①</sup>

野田茂

潮海辰亥毕业于京都帝大法学部，并取得了司法及行政两

<sup>①</sup> 此为野田茂对潮海辰亥的检举材料，编者作了部分删节。